© Alliance Bible Seminary
All Right Reserved

Goheen, Michael W. *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, I Am Sending You: J.E. Lesslie Newbigin's Missionary Ecclesiology*. Utrecht: Uitgeverij Boekencenturn, 2000.

高軒 (Michael W. Goheen) 這篇博士論文，主要探討宣教植堂理論的教會論，並以福音及教會傳統的宣教教會觀 (missionary ecclesiology) 為基礎。自主後392 年，提亞多修 (Thodosius) 宣布基督教成為國家的宗教後，基督教帝國教會觀 (Christendom ecclesiology) 成為主流思想，並深深影響西方文化。然而自啟蒙運動後，西方基督教帝國意識瓦解，非西方教會日漸成長，正因西方主流宗派教會式微，建構宣教教會觀的需要就更迫切（頁5）。作者以廖畢真 (J.E. Lesslie Newbigin) 為焦點人物，探討其對宣教教會觀的理解。除導言外，全書共分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為廖畢真的宣教教會觀的歷史發展，第二部分則對廖畢真的教會觀作系統化探討，第三部分為宣教教會論的具體應用。

第二章〈由基督教帝國至宣教教會觀（1909-1959 年）〉：記述廖畢真在大學歸主後，對跨越文化宣教有負擔，曾經遠赴印度宣教。他透過宣教工場開闊了眼界，獲得不少接觸普世教會的經驗，自 1940 年起，強調教會是宣教的教會（頁 23）。

第三章〈由基督為中心至三一式宣教教會觀（1959-1998年）〉：在1957至 1961 年間，廖畢真開始由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觀，孕育出三一式宣教教會觀。特別他在 1961 年新德里 (New Delhi) 大會上，領悟到上帝的宣教 (Missio Dei) 應為教會的焦點，因此積極建構三一式宣教教會觀（頁60）。

第四章〈上帝的宣教作為教會宣教身分的處境〉：廖畢真嘗試把上帝在教會以外，於人類文化及歷史的工作，納入上帝的行動，因此由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觀，擴展至以三一上帝主導的宣教教會觀（頁118）。這種教會觀著重從國度的層面剖視教會的宣教使命（頁141）。同時，廖畢真的宣教學亦強調聖靈論的重要，聖靈論被置於基督論及終末論的架構底下，演繹聖靈的見證（頁 154 ～ 155）。

第五章〈教會的宣教性質〉：廖畢真慨歎自啟蒙運動以後，科學世界觀迫使基督教信仰邊緣化，他致力促進教會的合一，並且重申教會乃宣教的教

© Alliance Bible Seminary
All Right Reserved

會。作者指出廖畢真在採用三一式宣教教會觀的時候，並沒有放棄以基督為中心，及教會作為上帝在地上工作的媒介的思想（頁159）。他在同意上帝在教會及世界裡工作的同時，並沒有淡化教會宣教的使命（頁221）。

第六章〈宣教的教會作為一個機構〉：作者引用碧賀夫 (Hendrikus Berkhof) 的教會論，作為探討廖畢真的教會論的引子。碧賀夫的教會論主要有三點：教會乃機構、教會乃群體、教會迎向世界（頁228～229）。作者指出廖畢真在六十年代前，推崇印度鄉村的小型地方堂會形象，但六十年代後期，則較為接納複雜的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色彩的教會觀（頁234）。廖畢真在抗拒聖職主義 (clericalism) 與會眾分割，形成階級趨勢的同時，亦保持牧職人員的重要角色（頁246）。牧職人員負責聖道及聖禮、祈禱，並提供培訓，及參與在世界的服事（頁250～251）。廖畢真認為牧職制度必須與教會宣教召命相符，而牧職的形式則必須有彈性；他亦非常重視宣教的教會的主日崇拜，特別是宣道與聖洗和聖餐聖禮。

第七章〈宣教的教會在世界的工作〉：廖畢真強調教會被差派完成佈道、教會見證，及文化中蒙召 (callings in culture)，並著重教會的宣教使命，是為了榮耀上帝及使人歸信基督 (conversion)（頁277）。廖氏將救恩視作終末實體，使神與人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生態方面達致團契，恢復大自然的秩序。他認為救恩並非將人抽離現實世界（頁294）；面對世俗文化，基督徒可以選擇逃避、迎合 (accommodation) 或忠心，及為主受苦作見證（頁310）。而教會聚合的目的，就是裝備信徒進入世界，見證基督（頁313）。

第八章〈宣教的教會與文化處境的關係〉：作者指出廖畢真探討福音處境化的過程，並不屬於翻譯模式 (translation model)，也不屬於適應模式 (adaptation model)，而是屬於跨文化溝通模式 (model of cross-cultural communication)（頁336）。他指出跨文化溝通必然觸及終極信念的衝突，因此，宣教必須邀請人歸信基督。同時，聖經真理的詮釋需要尋找經文敘事的意思，運用文化的素材適當表達（頁338～339）。廖畢真對費爾 (Hans Frei) 及林貝克 (George Lindbeck) 的敘事神學甚感興趣（頁123）。作者指出，廖畢真在避免混合主義 (syncretism)、不適切世界、民族中心主義及相對主義的努力值得欣賞，不過卻批評廖氏對文化的理論探討不足夠，同時亦未能提出一套建基於聖經的文化神學（頁369）。

© Alliance Bible Seminary
All Right Reserved

第九章〈在西方文化中宣教的教會〉：作者指出廖畢真發現西方教會活在混合主義的境地，並將現代科學世界觀作為教會福音所要適應的目標。廖氏提出，作為宣教的教會，會促使神學知識論的革新（頁372）。在笛卡兒 (Rene Descartes, 1596-1650) 、洛克 (John Locke, 1632-1704) 、培根 (Francis Bacon, 1561-1626) 、牛頓 (Isaac Newton, 1642-1727) 等將理性抬舉至超越信心的地步後，人將視科學為真理（頁380）。面對這種知識論，廖畢真從科學歷史及知識社會學汲取智慧，強調在認知過程中詮釋群體的角色。他引用普蘭尼 (Michael Polanyi) 的人格化知識 (personal knowledge) 及麥彥泰 (Alasdaire Maclntyre) 的典範轉移觀念，扭轉主客體分割的問題(頁383)，廖畢真努力印證基督教信仰乃公共真理 (public truth) ，力挽基督教帝國解體後，基督教信仰邊緣化的惡運。作者指出，一直以來，改革宗教會論傾向入世，重洗派教會論則傾向從世界中退隱（頁403），廖畢真汲取了兩者的元素，讓它們互補不足。他既強調教會作為另類群體 (alternative community) ，同時亦強調教會差遣信徒分散在文化中見證福音（頁415）。

第十章〈廖畢真宣教的教會論的本質及適切性〉：作者指出廖畢真發展其三一式宣教教會論的時候，仍然強調聖子耶穌基督的中心地位，可惜卻未能清楚剖析聖父及聖靈在創造、護理方面等課題（頁421）。至於廖畢真甚少把教會作為一個機構的觀念，與教會指向世界的觀念連在一起，對此作者建議使用碧賀夫的觀點作補充（頁422）。他指出雖然廖畢真著重聚集與分散的教會形態，卻較少演繹分散的教會，他將教會置於國度觀下理解，並集中於教會作為機構及聚集群體的向度（頁423）；此外廖氏在處理處境化課題時，仍未提供堅固的聖經基礎（頁424）。作者欣賞廖畢真引用科學哲學及知識社會學，表達教會乃另類社會秩序，然而指出他在綜合改革宗及重洗派傳統方面，尚未達致完滿。同時，廖畢真引用印度宣教的經驗，套用於西方教會，面對個人主義時強調群體性，在抗衡混合主義時則強調教會對文化的批判，可惜他未能建構出既有個人、又有群體的見證，教會既與社會文化團結亦分離的教會論，適切西方文化處境（頁426）。

綜觀全書，高軒清楚分析廖畢真的宣教教會觀，並能按其生平及不同時期著作的思想重點，勾勒三一式宣教教會論的發展。作者在資料搜集及分析方面十分全面，評論客觀中肯，並在探討宣教學的神學基礎方面，提供很多

© Alliance Bible Seminary
All Right Reserved

有用的建議，例如三一論的處理並非抽離歷史的耶穌，或者放棄基督為中心的焦點。這種觀點正好反映當代三一論的思想方向。

從聖靈論出發，按基督論及終末論演繹聖靈的工作，是當代神學關注的地方；從敘事神學角度探討教會作為詮釋群體的觀念，是當代神學重視的思想，至於人格化知識論，也是當代科學與神學對話關注的觀點，當然，跨文化溝通理論亦是當代宣教學重視的課題。作者詳細描述廖畢真的宣教教會論思想發展歷程，展示其對當代神學及宣教學討論的貢獻，並提出批評，這實在令神學及宣教學研究皆有裨益。作者從廖畢真的教會觀引申如何結合改革宗及重洗派觀點，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。作者在論文中列舉廖畢真教會觀的限制，並批評他以印度的經驗，作為解決西方教會的問題時缺乏處境性。筆者認為作者的論文長於敘述，在聖經及神學理據方面也有批判分析，可惜卻沒有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向；至於廖畢真教會觀是否有效幫助西方教會面對後殖民時代的挑戰，亦沒有足夠的討論。總括而言，高軒的論文，仍然未能對如何使廖畢真教會論變得更完善這課題，提出更詳盡的建議。

郭鴻標

All Right Reserved